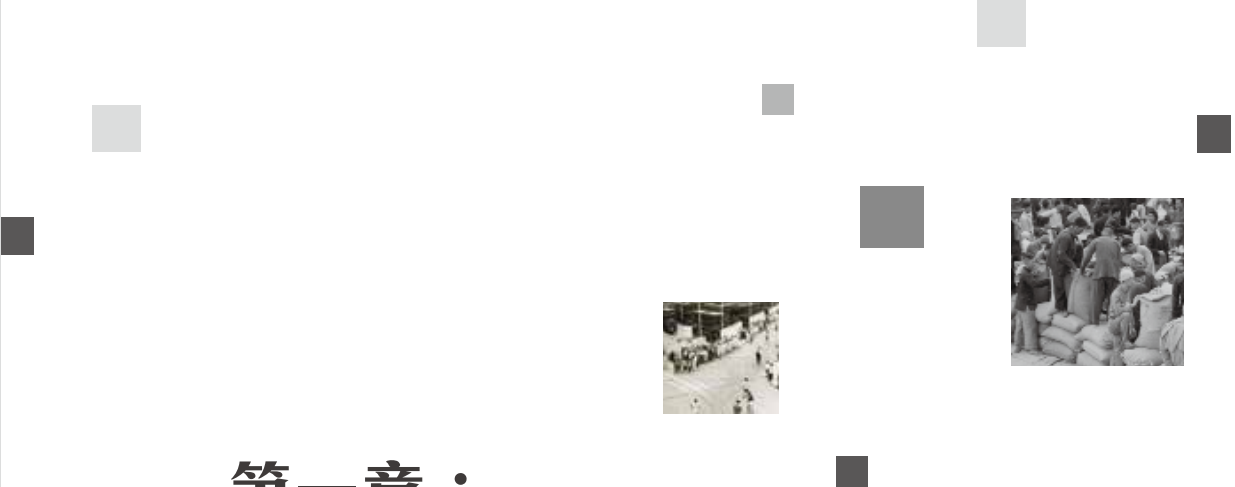




第一 部 分

文 本 記 述



第一章： 創立與自強的四五十年代

戰後的香港，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工人生活極度苦困。工聯會在新中國誕生前一年成立，那是一個黑夜與黎明交替、民生困頓、勞資矛盾與民族矛盾激烈尖銳及民族意識高漲的年代。

工聯會成立後，凝聚各行各業群眾，團結自強，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爭取及維護工人權益，興教施醫、創辦服務、賑災扶貧、紓解民困，克服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奠定了工聯會的基業，充分彰顯了工人前輩創業的艱辛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1946年9月，21間工會組成「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為「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教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初時沒有校舍，借用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會址上課。1946年9月第一間勞校誕生，到1948年多達12間。1949年5月，港英政府企圖解散勞校，工人、家長、教師和學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圖為1949年9月，位於駱克道的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會址。



1948年初，22間工會籌備組織工會聯合會，4月13日在摩托車研究總工會會所舉行第一次會員代表會議，定名為「港九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會員代表大會是工聯會的最高權力機構，65年來舉行了35屆。1948年4月17日，朱敬文理事長（前排右九）、張振南副理事長（前排右八）及張東荃副理事長（前排右十）與理事們合照。



1949 年 4 月，工聯會開展「全港工人文教運動」，讓工友通過學習或福利事業組織起來，以達到提高認識、活躍工會、擴大和鞏固工人團結之目的。文教運動的開展，同時培養了大批青年工會工作者。圖為 1949 年 5 月，工聯會舉行紀念「五·一」勞動節暨港九工人文教運動大會。



第三屆代表大會於 1950 年 4 月 8 至 9 日在加路連山孔聖堂舉行。



戰後，全港僅 6 間官立小學，每學期學費 30 元，私校收費 100 元以上，而當時五金廠女工的日薪僅僅 1.5 元，勞工階層怎能負擔得起？為解決工人子弟求學難的問題，1946 年 9 月「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成立後，開始創辦勞工子弟學校，圖為勞校學生參與賣花籌款，籌集經費。



五十年代，工聯會相繼創辦第一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工人留產所、第二工人醫療所、荃灣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中醫診所。當時，失業嚴重、三餐不繼、缺醫少藥的患病工友在工人醫療所得到了診治。圖為 1951 年 7 月 15 日成立的第二工人醫療所之外貌。



1953 年六村大火。深水埗石硤尾等六村發生空前大火，當時災民人數逾 6 萬。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粵穗分會及時匯來人民幣 10 億元（折合港幣 23 萬多元），送來大米 70 萬斤。工聯會和中華總商會接受委託，發放救濟米，工作十分繁重。



1954 年 7 月，電車公司資方有計劃地開除電車工會工作人員和工會負責人，以達清除工會力量之目的，事件稱為「莊式除人」。工人採取停工抗議行動反對資方行為，工聯會 10 月成立委員會促解決糾紛，直至翌年 2 月阻止行動。圖為電車工人停工抗議資方莊士頓無理除人，全廠沒有一輛車能開出。





1957年11月，香港海軍船塢突然宣佈兩年內關閉，解僱全廠4,600名員工。工聯會及各工會成立支援委員會，40多萬各業工人簽名支持。終在1959年6月，成功爭取員工就業及補償。圖為五金工人支持海塢工友鬥爭發起的簽名行動。



1958年，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鼓舞下，近萬名香港技術工人回內地參加國家建設，把技術獻給祖國。圖為工人們到車站歡送回國參與的技工。



1958年8月，工聯會11屆二次會議議決籌建工人大會堂（後改名工人俱樂部），9月成立了籌建工人大會堂委員會。工人俱樂部由1958年開始籌款至1964年8月28日建成開幕，歷時六載，幾經艱難曲折，終於為工人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活動場所。工人俱樂部的籌建，是各業工人前輩節衣縮食、群策群力的結果。各業工人千方百計、各出奇謀：義印、義剪、義車、義縫、義修、義賣及義務勞動。圖為1961年買得土瓜灣一幅地興建工人俱樂部。



一、工聯會的成立

工聯會的成立並不是偶然，而是社會客觀形勢所造成的一種必然。由意識的醒覺，到條件上的配合，再到實際環境的需要，發展出強大的愛國愛港工運力量，開闢了香港愛國工運的一段輝煌歷程。

工聯會成立的背景

意識的醒覺。香港工會運動早於二十年代已經相當蓬勃。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一開始就是中國工會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充滿愛國主義精神，富有鮮明的反帝國主義¹和反殖民主義²的色彩，有着工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特點。這兩次罷工，在香港以及中國工運歷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象徵着香港愛國愛民族意識的醒覺，而罷工期間成立的香港總工會，更是工會聯合壯大意識的肇始，奠定了戰後工聯會成立的團結基礎。

1925年發生的省港大罷工，引發了廣大工人對組建香港總工會的需求。次年4月15日，經過各工會組織協商，在廣州召開了香港各工會團體聯合大會，宣告成立「香港總工會」。會上，總工會發表《香港總工會宣言》：「我們香港工人群眾，處在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大本營裏面的工人群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急先鋒……不統一香港工會的組織，將會有被帝國主義者更殘酷更壓迫的危險。……香港工人階級

的解放，與全國工人階級的解放及中國民族的解放是同一條道路。香港總工會成立以後，切實與全國工人階級聯合，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並受其統一的指導，為謀求全國工人階級之解放而奮鬥。」從此，香港工會在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把香港工人運動，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渾然融為一體了。儘管香港總工會遷到香港後，在1927年5月遭港英政府查封，但她在香港工運史上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是顯然易見的。她的成立，對四十年代後期香港愛國工會再次聯合並成立「港九工會聯合會」有着深遠的影響。

工聯會的成立，是二十年代愛國工運的延續和發展，而日本侵華所帶來的苦難和對新中國誕生的空前憧憬，更激發了強烈的愛國意識。日本侵華期間，香港工人愛國意識高漲，一批工會骨幹北上參與抗日。戰後歸來，當年的游擊隊成員再次成為工會的中堅分子，愛國熱情不減。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響亮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解放戰爭轉入全國性戰略進攻階段，人民解放軍取得節節勝利。這時，新中國誕生的曙光已清晰可見，在殖民統治下受盡剝削壓迫的香港工人群眾愛國熱情再次高漲。

條件的具備。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重新佔領香港，為防美國扶蔣政策³對香港殖民統治造成威脅，港英政府對日本統治時期的高壓政策作出了改變，允許工會逐步恢復運作。抗戰期間離港參與抗日的工會

1 反帝國主義，即反對任何國家通過奪取領土，建立政治或經濟霸權，將本國的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

2 反殖民主義，即反對一些強大的國家越過自身的邊界而建立移民殖民地或行政附庸機構，藉以對外延伸其主權。

3 美國扶蔣政策：二次大戰時，美國為了加強對抗日本的力量，透過多種措施助華抗日，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建立緊密的支持援助關係。及至二次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打擊德日兩國為重點的政策變成過去，焦點轉向與蘇聯的關係，故調整對華政策，介入國共兩黨的矛盾，透過多種形式支持中國國民黨，希望藉此削弱蘇聯，以至於整個共產主義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與此同時，英國卻擔心美國的扶蔣政策，會提升中國國民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的可能性。

骨幹，這時也先後返回香港，為香港各工會的恢復提供了骨幹力量。

抗戰勝利前夕，在廣東惠陽、東莞和寶安參與抗日游擊戰的一批工會骨幹，於寶安沙魚涌開展了恢復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的籌備工作，及至1946年1月3日，香港海員工會在油麻地大金山茶樓正式宣佈恢復。與此同時，各行業的愛國工會也如雨後春筍般恢復或誕生，如香港洋務工會、香港電車公司華員職工存愛會⁴、摩托車研究總工會⁵等等，都紛紛在港英華民政務司⁶登記掛牌。一些行業在籌建工會過程中遇到資方阻力，就先用其他形式把職工組織起來，如「香港英美煙草公司華員職工聲韻社」⁷、「印工業餘憩廬」⁸等，都是用業餘休閒的姿態，避過當局和資方的目光，把工人團結起來，再申報成立工會。這些工會成立以後，都是立足於關注生活，改善工人福利待遇等，團結凝聚了一批工人群眾，為工聯會的成立奠定了組織的基礎。

民生困苦帶來實際工會工作需要。當時香港正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困難時期，滿目瘡痍，百業凋敝，民生困苦，廣大工人處於失業和貧困之中。國共內戰期間，更令香港物價飛漲，民怨沸騰。資料顯示，1946年的工資比戰前上升了4倍，而物價卻上漲了7倍，工友的生活

-
- 4 「香港電車公司華員職工存愛會」是「香港電車職工會」的前身，簡稱「電車工會」，成立於1920年。
- 5 「摩托車研究總工會」，後改稱為「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前身，成立於1920年。簡稱「摩總」，亦有稱「摩托工會」。
- 6 華民政務司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成立來專門處理華人問題的機構，具有行政及司法的雙重功能。它的職責範圍包括管理及協調本地各華人社團及慈善機構，並協助其他政府部門制訂各項與華人相關的政策，並且在一些涉及鄉事及傳統風俗問題糾紛中擔任仲裁角色。
- 7 「香港英美煙草公司華員職工聲韻社」乃「港九煙草業職工總會」前身，簡稱「煙業工會」，成立於1946年。
- 8 「印工業餘憩廬」與現時的「香港印刷業工會」有很深的淵源。其創始人之一乃工聯會前理事長潘江偉，及後創辦了「港九印務職業工會」，1975年更促成與港九石印業職業工會、香港中華書局產業工會、商務印書館職工會聯合，成立了「香港印刷業工會聯合會」。及至1985年7月，4間工會正式合併為現時的「香港印刷業工會」。

十分艱難。失業嚴重，工友的叫價只能是「有食無工」，但求兩餐，不求工資，每天做足12小時始夠糊口。與此同時，香港的物資嚴重缺乏，港府發放購物證，豬肉每人每周只得4兩8錢，蔬菜只得1斤14兩4錢。工友放工大多在街邊飯檔吃飯，一餐兩毫，由於餸少，故總是說句「加多啲汁」。

1946至1947年間，是工潮頻繁的兩年，主要都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僅是1947年已發生勞資糾紛多達40宗，8月份還出現了罷工高潮，參加者多達5、6萬人，成為省港大罷工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工潮此起彼落，涉及面廣。這些工潮所關注的，包括：海員反包工制⁹、船塢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¹⁰、公共事業工會¹¹和兩巴¹²工友爭取改善生活待遇等等。

這個時期的罷工鬥爭，雖然勞方取得部分勝利，但也暴露了香港工運的弱點，一是各自為戰，焦點分散，未能合力和形成聲勢，部分

-
- 9 戰時船隻損失重大，海員過剩，因此包工包攬了僱請海員的權力，海員落船工作即被扣薪高達50%以上，此外還要給包工茶錢、黑錢，受到沉重的剝削，故海員工會提出要求取消包工制。
- 10 1945年12月15日，港英宣傳增加津貼1.5元，但三大船塢卻減工資，實行戰前的九小時工作制，激起工人憤怒。經過了8次的談判，終於成功爭取由1946年2月1日起實施八小時工作制。
- 11 1946年5月，以電燈公司工人出面，電車和電話公司工人積極支援，結果均能取得勝利，港燈更於1946年7月5日成功簽訂了首份勞資合約，爭取到八小時工作制、基本八級工資制、年資遞升制、10年退休金、住院醫療福利、18天有薪假期、十度免費用電、喪葬等福利制度。1947年9月，電話、電燈、電車、中電、煤氣工會，經一個多月的談判取得成果。其中，電燈工人取得第二份改善待遇協約，實現第二次加薪及取得年終雙薪待遇；電車工人取得加薪，每星期放假一天，並一律發給甲級生活津貼等等。
- 12 1946年5至6月期間，港九兩巴經摩托車研究總工會的대표和兩巴工友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工友團結鬥爭，終於成功將工時由9小時改為8小時，超時補水作1.5小時計，每天工資亦由5元增加至6元，改善生活津貼，年尾雙薪及5%酬勞，訂立病假、有薪例假、傷殘待遇、奠儀等。1947年9月，港九兩巴工友爭取加薪50%。通過補水雙計，例假由每周2天增加至4天，發給制服等。及後，又於12月與資方訂立了工人退休金協議。

罷工因得不到廣泛物質的支持而不得不放棄；二是部分工會提出過高要求，缺乏理性，取得勝利的機會較小。當年華機會¹³提出加薪150%，使勞資雙方都沒有下台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形勢迫使各業愛國工會再次產生聯合起來的願望，期望能統一各行業工會的意志，形成拳頭，為爭取自身權益團結起來組織行動。促成這種聯合的，是「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¹⁴，也即是後期的「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為「勞教會」。

勞教會的成立

勞教會的成立，為工聯會的建立準備了領導力量。二戰結束後，香港校舍缺乏，師資不足，造成大量兒童失學。雖然全港有6間官立小學，學費每期亦只是30元，但學額根本無法滿足需求；而私立學校每期學費則高達100元以上，勞工階層根本無法負擔，以致工人子弟陷於失學的境地。為回應工友的要求，21間工會聯合起來，於1946年組成「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1946年9月，第一間勞校成立，由於當時沒有校舍，只得借用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位於灣仔駱克道的會址上課。1947年2月，第二間勞校——「旺

13 華機會成立於1908年，1920年曾領導機工爭取加薪得到勝利。1947年2月，華機會向勞工處呈文，指出政府部門和英資企業的機工薪酬比華資廠的技工特別低，要求資方加薪150%，但遭勞工處婉拒。隨後華機會多次向勞工處呈文仍不得要領，於是在8月14日發出最後通牒，並於15日開始罷工。隨後雙方進行會談，資方答應加薪額從20%提升至45%，曾一度提及升至50%，而勞方則將150%的要求下調至120%，但仍未有共識。及至第七輪談判情況急轉直下，資方的加薪方案又退回45%，華機會代表才急急答應加薪50%就安排復工。然而，當初叫價太高，工友一下子沒法子接受談判的結果，對工會提出多項質疑，自此工會會員出現離心傾向，華機會慢慢走向沒落。

14 第一屆的主要負責人包括：朱敬文、張東荃、張振南、陳文漢、黃溢聲、麥逢德、麥耀全。

角勞工子弟學校」成立。到1948年，已創辦了12間勞校，在學學生達2,000多人。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勞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也為港九愛國工會的聯合打下了基礎。

工聯會的成立

1948年初，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的大部分成員工會，聯合向港英提出申請，要求成立港九工人統一組織「港九總工會」。港英政府礙於當年省港大罷工的經驗，對此存有很大的戒心，擔心各工會組成一個緊密的統一組織後，能領導、指揮、調動港九勞工統一行動，成為強而有力的壓力集團，對港英殖民統治不利。於是他們採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拒絕成立總工會的申請，只同意成立工會聯合會，規定聯合會與各屬會之間沒有直接領導關係，只是一個聯合、協調機構；而工聯會不可在政府華民政務司登記為職工會，只可在警務處登記為一般社團團體。因此，工聯會成立於1948年4月，卻到1949年7月16日才以「港九工會聯合會」的名稱正式獲准社團登記。

工聯會的成立是由張振南、陳文漢、劉耐、張東荃、朱敬文、麥耀全、譚其科等前輩發起。籌備時有22間工會¹⁵參加，會員2萬人。1948年4月13日在摩托車研究總工會會所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會議，選出電車、電話¹⁶、海員¹⁷、洋務¹⁸、摩托、海協¹⁹、太塢²⁰、木匠²¹、

15 工聯會籌備時有22間工會，創會有21間，當中有部分重複，故籌備及創會工會合共28間。事隔多年，部分工會出現合併或結束營運，故現存只剩24間。

16 「香港電話公司港九華員協進會」，成立於1946年，現已改稱為「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17 「香港海員工會」，成立於1921年。

18 「香港洋務工會」，成立於1921年。

19 「香港海軍船塢華員協進會」，現已停止運作。

20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現已改稱為「香港聯合船塢集團總工會」。

21 「香港木匠總工會」，成立於1919年，現已改稱為「港九木匠總工會」。

聯愛²²等9個單位為常務理事，電車工會朱敬文被選為第一屆理事長，電話工會張振南和海員工會張東荃為副理事長。

1948年4月17日，在灣仔六國飯店²³舉行港九工會聯合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職員就職典禮，確立宗旨為：

1. 聯繫各工會，促進彼此間的互助及團結；
2. 指導發展工人文化教育，提高工人技術水平；
3. 推廣工人福利事務，改善工人生活；
4. 爭取與保障各會員工會之合法利益。

工聯會順應時代和工人群眾的需要成立，而成立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則決定了她的性質、宗旨和其日後的發展。她的成立，宣告了香港愛國工會運動從此有了一個統一的領導，標誌着香港愛國工運從此揭開新的篇章，亦開始了她的艱苦卓著的奮鬥歷程。

二、成立初期的社會形勢

成立初期的社會形勢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方面：

港英透過立法，加強對左派的壓制

隨着中國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港英開始憂慮中共收回香港的可能性及所造成的威脅，故對相應策略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1949

年3月，英國內閣會議對香港問題作出了決議，要削弱和壓制中共在香港的活動，並授權殖民地大臣實施推行。4月，港督葛量洪致電殖民地大臣，建議制訂一些緊急狀態條例，並採取一些相應的行動，包括封閉左派報紙、封閉邊界、控制人口、實行移民登記、對糧食燃料等實行定量供應等。

根據這些建議，港英立法局在1949年一年內，接二連三地炮製出一系列嚴苛的法例：1月，制訂《人民入境統制條例》，規定禁止有鼓動叛亂或擾亂公共安寧的嫌疑者入境，或有權將其拘留並遣送回原籍；4月，制訂《違反罷工與罷僱條例》，嚴厲制止罷工；5月，制訂《1949年社團條例》，規定香港所有社團都必須註冊，不容許搞政治活動，不容許境外分支團體的註冊，已成立者要停止活動；8月17日，立法局同時二三讀和首讀了三條條例：《人口登記條例》、《遞解不法分子出境條例》和《1949年修訂第二號緊急措施》。根據《人口登記條例》，全港居民都要領身份證，而在執行條例時，當局可以隨時搜查居民的身體、住宅及所有財物，並得以拘留或逮捕。《遞解條例》授權當局可通過簡單的審訊，認定某人為不法分子即可將其驅逐出境，又授權港督興建集中營，用以扣留大量的可疑不法分子。《修訂1922年的緊急法》更規定：港督會同行政局依據緊急法令所頒佈的各種法令，在與其他法令相抵觸時可以凌駕其他法律。

這些條例立法完成後，港英就開始了對左派團體和人士進行瘋狂的迫害，透過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或不予理由，將之逮捕、毆打，甚至遞解出境。香港進入一個愛國有罪的年代！

22 「香港政府華人職工聯愛會」，成立於1940年，現已改稱為「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

23 在灣仔警署附近，現已重建。

經濟遇困境，由轉口港轉型成工業城市

在此之前香港基本上是個轉口港，但隨着形勢的轉變開始產生變化。1946年以後，中國內地尤其是上海棉紡廠的資本家開始流入香港，帶來資本、技術、熟練工人甚至工廠，為香港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及至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聯合國又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香港當然地跟隨英國的政策切斷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往來，從此香港的轉口貿易急轉直下，經濟陷入困境，工人生活百上加斤。進入五十年代以後，香港憑着本身已具備的基礎，加上外圍對成衣需求的增加，於是從外國進口棉花，加工成為製成品或半製成品，再向外出口，香港的製衣業因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並帶動了建築、五金、商業、零售和銀行等行業迅速發展。這個時期的經濟發展，標誌着香港已從轉口貿易轉變為以自己生產為主的工業城市。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變。

在這樣的政經形勢下開展工運，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戰後經濟困難導致工人職業生活困苦，勞資糾紛增加。加上工人沒有勞工法例的保障，令勞資矛盾更趨激烈。二是港英對愛國工運採取高壓政策，企圖扶右抑左²⁴，縱容右派對左派的肆意攻擊，資方隨意除人以進一步清除內部的愛國工人勢力等等，這都給愛國工運的開展帶來困難和險阻。正因如此，工聯會成立頭十年是「三多」的時期——港英對愛國工會迫害多；工聯會開展運動多；工人為爭取權益鬥爭多。然而，這個時期是工聯會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其中許多的工作，為工聯會後來的發展壯大奠定了物質和精神基礎。

24 港英政府透過扶助國民黨等右派人士打擊左派運動，藉以打壓左派在香港的發展，實行以右派的力量來遏制左派勢力。

三、建立工會合法地位，促進會務發展

1948年3月3日，律政司頒佈了《一九四八年職工會及勞資糾紛爭議條例》，規定所有職工會必須向當局登記註冊。為保障工會的合法地位，工聯會成立後，首先做的便是義務協助各工會註冊。從6至9月，先後協助工聯會屬會及其他工會共48間工會，按法例的規定和工會情況起草會章，辦理了登記手續。

工聯會成立正值祖國解放前夕，各業工人愛國熱情高漲，紛紛要求學習文化，提高認識，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樹立當家作主的思想。為順應群眾的要求，工聯會1949年4月在第2屆會員代表大會上通過開展「港九工人文教運動」的決議，成立文教運動委員會協助各工會開展文教工作，並為各工會聘請文教服務員，設立圖書館等等。

此外，工聯會還成立歌劇輔導委員會，協助工會成立歌劇組、文娛班組等，創作適合工友口味且富教育意義的歌劇及文藝節目。1954年工聯會設立了工人康樂館，推動屬會開展各類體育活動，如小型足球賽、乒乓球賽、籃球賽、象棋賽，以及陸運會、水運會等等，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參與，鍛煉和培養了大批工作人員，促進了工會的發展和壯大。我國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就是從工聯會康樂館的工人乒乓球隊走向世界的。這些活動，對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識水平、活躍會務、強化工會建設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四、關心民生疾苦，創辦福利

工聯會誕生於民眾生活困苦的年代。戰後香港本來就百業不景，到五十年代加上朝鮮戰爭期間實行禁運，對香港的經濟和工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即使有工做也經常被「壓糧」。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人失業、

失醫，工人子弟失學情況嚴重。

為紓解民困，1950年4月工聯會舉行第3屆會員代表大會，總結了工聯會第2年的工作，作出了「關心群眾疾苦，創辦工人福利」的決議，開展了一系列失業及醫藥救濟、籌募福利金，大辦工人福利工作，如發放救濟米、設置工人食堂、免費或優待失業工人用膳等。這個時期工聯會所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民困，樹立了工聯會關心工人疾苦的旗幟，為工聯會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支持勞校籌款建校

勞教會至1948年已發展勞工子弟學校12間，但次年港英政府即以2間新官立學校的開辦及勞校校舍乃「不合適校舍」為名，向勞校停止發放津貼及吊銷牌照。在各方壓力下，只有5間勞校得以保留，但港英派來了官委校長，希望加強對勞校的控制。官委校長的理念，與學校上下出現很多不適應的問題，在學生、家長、教師等等多方不合作及反對的情況下，5位官委校長最終自願辭職。此後，勞校成了港英政府的眼中釘，非要拔走不可。教育司1950年乾脆要求旺角勞校將校舍交還業主，令700名學生陷入失學的危機中，急需另行興建新校舍。於是工聯會在1950年5月，開展了賣花籌款活動，售出超過100萬朵，為勞校興建校舍籌得28萬3千多元，籌得款項創下香港歷年來賣花籌款的最高紀錄。按當時全港人口計算，等於每兩名市民中就有一人買了花，可見響應者有多踴躍。最終新校舍²⁵在1951年4月正式建成啟用。

25 今日的旺角勞校校舍，是在七十年代在工會的努力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支持下，共籌得4,000萬元改建成的。

創辦工人醫療所

1950年7月3日，勞教會借出位於駱克道142號的半間會所，海員、洋務、郵務三間工會借出港幣3,300元，在李崧等醫生支持下，試辦工人醫療所。通過福利運動、社會人士贊助捐贈和醫生的支持，工聯會終於在1950年12月辦起了第一工人醫療所，其後又於1951年7月辦起第二工人醫療所；1952年1月辦起X光檢驗所；4月，在上海街辦起留產所²⁶；1955年5月辦起中醫診所。此後陸續發展了多間工人醫療所，從香港、九龍到荃灣，從西醫到中醫，同時推動工會建立了醫藥補助和生育補助等制度，醫療補助券每次2元、生育有「薑醋金」等等，為廣大工人和家屬減輕了不少醫療負擔。

在工會和工人群眾的支持下，工人醫療所不斷發展，至今已成為擁有一定規模的工人醫療機構，診病人數不斷增加，每年服務數十萬人次。

籌建工人俱樂部

1958年8月，工聯會召開第11屆會員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決定籌建工人大會堂。當時港英政府不容許工聯會用此名稱，但這項計劃卻促使了政府從速興建原已擱置的市民大會堂——即現時位於中環的香港大會堂。工人大會堂遂改名為「工人俱樂部」。為籌建俱樂部，各業工人、各界市民出錢出力，當年有近500位社會知名人士擔任了籌委

26 現時大多數嬰兒都是在醫院出生的，但在四、五十年代公立醫院服務不足，不少孕婦都在留產所產子的，由俗稱「執媽」的助產士接生。隨着香港出生率不斷下降，留產所亦於八十年代成為歷史。

會的顧問和贊助人；許多廠商捐出物品支持義賣；電影、文化、婦女各界舉行義演、義映、義展等，結果籌得 270 萬元。然而，政府不予撥地，工聯會於是買了土瓜灣近 11,000 呎的樹膠廠興建，但此時政府又遲遲不審批圖則。到批文下來了，由於建築成本飆升，錢變得不夠用了，被迫賣了三分之一左右（近 4,000 呎）的面積給銀行建員工宿舍。工人俱樂部最終於 1964 年 8 月 28 日建成啟用，歷時六載，幾經艱難曲折，終於為香港工人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活動場所。

工人俱樂部得以順利建成，體現了工人及各界市民團結的力量。正如工人俱樂部地下大堂的「落成碑文」所寫的：「誰實支持 士農商學 大廈建成 工人俱樂部」。

生活服務

五十年代初期，根據工人的實際情況，工會舉辦了子弟管教班、工人服務部、技術班、車縫班、飯堂、中樂組、粵劇組、福壽會互助組、年貨儲蓄組、生產互助組等各種各樣的文化福利組織，又於每年代售年貨量達 150 噸。這些服務在當時很好地發揮了工會的功能，在聯繫群眾、教育群眾和服務群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賑災救災

當年香港工人居住困難，木屋區災難更是屢見不鮮。僅以 1951 至 1955 年統計，木屋區火災達 30 次以上，其中較大的有 1951 年 11 月的東頭村大火，災區長達 1 英里，受災人數 1 萬 6 千人；1953 年 12 月的石硤尾六村大火，受災人數 6、7 萬人。每當木屋區大火，工聯會都及時進行慰問。當時工聯會很窮，每次只能發給災民一包餅乾，但陳文

漢理事長總是親力親為，親臨災區慰問災民，呼籲港英政府積極善後，進行急救，解決災民的居住問題。在這兩次較大的火災中，獲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粵穗分會匯款送米，工聯會和中華總商會聯合發放給災民。

在紓解民困、大辦工人福利事業、開展失業救濟及勞工子弟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上，前理事長陳文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可貴的貢獻。他艱苦樸素，事必躬親。艱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使他 42 歲便在任內病逝，為工人和愛國事業獻出了短暫而光輝的一生，高風亮節，令人尊敬。

五、領導工潮，保障權益

「爭取與保障各會員工會之合法利益」是工聯會創立的宗旨。按照這一宗旨，工聯會在成立的頭 10 年中，為維護、爭取工人權益，參與和領導了不少鬥爭，其中主要有 1948 年的「的士工潮」、1949 至 1950 年的「電車特津鬥爭」、1954 年的「反對『莊式』除人鬥爭」和 1957 至 1959 年的「海塢關廠鬥爭」等。四十年代後期的「的士工潮」和「電車特津鬥爭」，更是工聯會成立後主動出擊的。

的士工潮²⁷

這次罷工是由港九 8 間的士公司工人爭取增加工資，改善待遇，修訂勞資協約而引起的。早於 1947 年 8 月，港九 8 間的士公司工友曾在工會領導下與資方簽訂第一個勞資協約，成功爭取將每天工資由 5 元增至 6 元，工時由每天 9 小時減至 8 小時，每年設有薪例假等，協約為

27 由 1948 年 9 月 20 日至 1949 年 1 月 21 日，歷時 124 天。

期一年。

及至1948年8月，勞資協約期滿，為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的士工友要求資方修訂勞資新協約。港九的士工人團結一致，在工會領導下與8間的士資方展開談判。雖經工人作出多項讓步，但由於資方在僱主聯會的指揮下，拒絕工人的合理要求，關閉談判之門，激起工友極大不滿，工友被迫進行罷工抗議。首先由明星的士的工友開展罷工，但其他7間的士公司隨即突然宣佈關廠停業，迫令工人交車及結數解僱，即所謂「一罷七停」，港九的士交通陷於癱瘓。

為支持的士工友的合理鬥爭，工會發動工友捐款支持，工聯會則發動屬下30多個工會及各業工人在金錢、物質和精神上給予大力支持，工聯會代理事長張東荃²⁸亦發表講話，呼籲社會人士支持的士工人。在整個的士工潮中，共籌得捐款17萬元，發給罷工工友每天生活費2元，每周慰問米20至30斤，的士工友團結一致，堅持着艱苦的鬥爭。

可是，資方在港英當局的袒護下，到省澳招請人手，再由交通部發出駕駛牌照准予開車，警方則着令限制的士工人的和平糾察活動。警方在尖沙咀驅逐糾察，200多名武裝警察與200多名工人糾察對峙，又在港島天星碼頭拘捕42位工人糾察及在九龍毆打糾察等。形勢惡化，引起社會的廣泛關心和同情，經工會和工聯會的再三努力，促使勞工處和華人代表羅文錦等出面調處，迫使資方於1949年1月6日重開勞資談判。在工會的據理力爭和的士工友的團結努力鬥爭下，終於在1月21日達成協議，簽訂了的士勞資協約，規定工人每天增加工資7毫半，每年有薪例假18天及死亡撫恤金等。歷時124天的工潮正式宣告結束。

28 朱敬文1948年4月當選理事長後，同年8月赴哈爾濱出席第6次全國勞動大會，其理事長一職由張東荃代理。

牛奶仲裁

戰後物價飛漲，生活津貼的調整趕不上物價的升幅，牛奶工人率先於1949年12月23日提出增加90元特別生活津貼（簡稱「特津」）的要求。1950年1月11日勞資雙方會談，資方認為增加特津的要求只是工會煽風點火的結果，群眾未必有此要求，工會遂提出可以召開全體工友大會。當晚工會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牛奶冰廠門前的馬路中心²⁹召開群眾大會，到場工友達1,300多人，這就是香港工運史上赫赫有名的「牛奶工人大擺火牛陣」。

面對牛奶工友的團結意志，資方被迫答應商討加薪辦法，1月13日資方提出仲裁，並表示工人如接受仲裁，一定會獲得收益。工聯會和工會從全局考慮，決定一試。仲裁會於2月3日舉行，勞方評議員是唐偉（勞教會秘書）、劉耀焜（工聯會秘書長）、陳文漢（工聯會副理事長），共召開18次會議，歷時一個多月，牛奶工友最後爭取到每人每月增加特別津貼30元的成果。四電一煤³⁰、兩巴³¹等公共事業，亦跟隨其仲裁結果，每月增加特津30元。

在香港工人運動史上，仲裁只此一次。

電車特津鬥爭³²

在牛奶工人爭取特別生活津貼之時，電車工人亦要求資方增加特別津貼，但資方拒絕談判，工友故計劃採取工業行動。礙於港英當局已

29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牛奶冰廠門前的馬路即現時皇室大廈與柏寧酒店之間。

30 四電一煤，即指電話、港燈、中電、電車、煤氣。

31 兩巴指九巴、中巴。

32 由1949年12月24日至1950年2月10日。